

国学经典文库 图文珍藏版



线装书局

唐宋八大家

散文
鉴赏



中国散文磅礴大气的最高成就
八大名家温文内敛的独特情怀



国学经典文库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

韩愈等◎著



线装书局



目 录

苏轼文集

刑赏忠厚之至论	(5)
留侯论	(13)
贾谊论	(21)
晁错论	(28)
续欧阳子朋党论	(34)
始皇论	(40)
上神宗皇帝书	(47)
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65)
王安石赠太傅	(71)
稼说	(76)
刚说	(80)
六一居士集叙	(86)
范文正公文集叙	(93)
书孟德传后	(100)
自评文	(103)
戴嵩画牛	(105)
书吴道子画后	(108)
记游定惠院	(111)
记承天寺夜游	(114)
记游松风亭	(116)
喜雨亭记	(119)
墨妙亭记	(122)



超然台记·····	(126)
李氏山房藏书记·····	(131)
眉州远景楼记·····	(136)
放鹤亭记·····	(141)
雪堂记·····	(145)
石钟山记·····	(152)
传神记·····	(159)
李太白碑阴记·····	(164)
亡妻王氏墓志铭·····	(169)
潮州韩文公庙碑·····	(173)
黠鼠赋·····	(181)
后杞菊赋并叙·····	(186)
前赤壁赋·····	(192)
后赤壁赋·····	(200)
秋阳赋并叙·····	(205)
上梅直讲书·····	(212)
答李端叔书·····	(218)
与王庠书·····	(224)
六一泉铭并叙·····	(230)

苏辙文集

臣事 一·····	(239)
臣事 四·····	(242)
民政 二·····	(247)
刑赏忠厚之至论·····	(252)
六国论·····	(256)
三国论·····	(260)
隋论·····	(265)
唐论·····	(268)
周公·····	(275)
管仲·····	(279)



始皇论·····	(284)
汉武帝·····	(287)
唐太宗·····	(289)
上枢密韩太尉书·····	(293)
为兄轼下狱上书·····	(299)
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303)
齐州闵子祠堂记·····	(308)
东轩记·····	(314)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	(319)
吴氏浩然堂记·····	(323)
上高县学记·····	(327)
武昌九曲亭记·····	(332)
黄州快哉亭记·····	(337)
藏书室记·····	(342)
待月轩记·····	(347)
孟德传 附子瞻题语·····	(350)
巢谷传·····	(354)
祭文与可学士文·····	(359)
元祐会计录叙·····	(363)
超然台赋 并叙·····	(370)
墨竹赋·····	(375)
卜居赋 并引·····	(381)
唐宋八大家散文评论选编·····	(386)
唐宋八大家散文文体知识·····	(430)

唐宋八大家散文鑒賞

苏軾卷

韩愈等◎著



綫裝書局



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甫,号东坡居士,亦称“大苏”,或“二苏”(苏洵长子景先早卒)。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有传。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诞生。少年时母



亲程氏授以书。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中进士。这次科举考试,欧阳修任主考官,梅尧臣是参评官,他们对于苏轼的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赞赏,列名第二。这期间,苏轼写了《进策》二十五篇,《教战守》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篇。仁宗时代,正是所谓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苏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

苏轼作了几年主簿、判官之类的地方小官之后,于英宗平治二年(公元1065年),调回京城,任殿中丞。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其中已包括苏轼提出的改革主张,但激进得多,也丰富得多。苏轼本当拥护新法,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使他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新法。于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转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熙宁九年(公元1077年)十二月又徙知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时遇黄河决口,苏轼亲率军民护堤守城,保全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徙知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就在这一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讥谤新法,加以弹劾,将苏轼逮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御史府。《汉史·朱传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因称御史府为乌台)。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出狱后贬为



黄州团练副使,又改调汝州团练副使。在一个时期中,苏轼心有余悸,不敢写诗著文。早在苏轼贬为杭州通判时,其表兄文与可就劝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见《石林诗话》)。可见当时“文字狱”的厉害。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此时,苏轼主张对王安石的新法“参用其长”,反对司马光等不加区别、一概废除新法的做法。正因此,他又为旧党所不容,被贬为杭州知州。在杭州任上,他率众开湖筑堤,颇有政绩,西湖中“苏堤”至今犹存。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新党再起,对“元祐党人”进行报复、迫害,苏轼又横遭贬谪,以六十高龄,被贬到荒远的琼州(今海南省)作别驾。宋徽宗即位,大赦,苏轼在赦归途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时年六十六岁。死后谥号“文忠公”。

苏轼一生的仕途是不平坦的,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屡遭贬谪,动辄得咎,成为北宋朝廷党争的牺牲者。

苏轼在思想上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他所标榜的“蜀学”,实际上是上述三家思想的杂合,所以说苏轼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但就基本思想来说,他还是属于儒家。

“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苏轼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文学上却得到极大成功。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作家,几乎在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里,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文坛领袖,这场诗文革新运动实际上到苏轼手里才算最后完成,苏轼的散文作品代表了北宋的最高成就。人言“韩潮苏海”,与古文大家韩愈相提并论;世称“欧苏”,与“宋代的韩愈”欧阳修并驾齐驱。释德洪《跋东坡仇池录》:“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行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其文章风格“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苏轼共写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实际上,其成就远远超过黄庭坚而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苏轼词开豪放一派,“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稼轩词序》)。与辛弃疾齐名,世称“苏辛”。苏轼的书法,取法颜真卿而又独创一格,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答谢民师论文帖》等墨迹存世。苏轼的画亦有名,曾颇有见地地赞誉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自己则爱画竹木怪石,取法文同(即文与可)而胜文同,在宋代画苑中,向来以“文苏”并称,苏画世存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多幅。



刑赏忠厚之至论

【题解】

这篇文章是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应礼部试时而作。文章援引古时仁者刑赏忠厚的范例,表述刑赏应以忠厚为本,以深切的爱民忧民之心待天下,严以立法,宽以责人,则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之道的儒家仁政理想。主考官欧阳修是当时文坛领袖,倡导古文,反对“时文”(骈体文),在这次礼部试中规定写时文者一律不取,考场上的苏轼写下这篇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文辞简洁平易晓畅的文章,深得欧阳修赞誉。欧阳修和参评官梅尧臣认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梅尧臣赞其有“孟轲之风”,欧阳修更“惊喜以为异人”,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此文使苏轼在北宋文坛崭露头角。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①,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②,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③,欢休惨戚^④,见于虞、夏、商、周之书^⑤。成、康既没^⑥,穆王立而周道始衰^⑦,然犹命其臣吕侯^⑧,而告之以祥刑^⑨。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⑩:“赏疑从与^⑪,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⑫,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⑬,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⑭。”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⑮:“鲧可用^⑯。”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⑰。”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⑱:“罪疑惟轻,功疑惟重^⑲。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⑳。”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㉑。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㉒,而



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仁^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③：“君子如祉^④，乱庶遄已^⑤；君子如怒，乱庶遄沮^⑥。”夫君子之已乱^⑦，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⑧，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⑨，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尧、舜、禹被儒家尊为古代明君。文王、武王灭商建周。成王、康王时代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

②哀矜惩创：怜惜惩戒。

③吁俞：惊叹应答。吁，感叹声。俞，表示应允。

④欢休：和善，高兴。休，美善。

⑤虞夏商周之书：指《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献，分《虞书》、《夏书》、《尚书》、《周书》四部分。

⑥没，同“歿”，死。

⑦穆王：周穆王，周朝的第五个帝王。

⑧吕侯：周穆王的大臣，建议周穆王从轻制定新法。

⑨告之以祥刑：语出《尚书·吕刑》：“有邦有土，告尔祥刑。”祥刑，即详刑，谨慎用刑。

⑩《传》：解说经义的文字。如《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一般指《左传》。

⑪赏疑从与：在行赏时，发现有可疑之处，宁可给予奖赏。与，给。

⑫罚疑从去：施罚时发现有可疑之处，就不罚。

⑬皋陶：尧时掌刑狱的大臣。士，狱吏。

⑭宥：宽恕。

⑮四岳：相传为唐尧的大臣，羲和的四个儿子，分管四方的诸侯。一说：四岳，姓姜，炎帝族，是一个人。

⑯鯀：传说为禹的父亲，奉尧的命令以堵截的方法治水无效，被舜杀死于羽山。

⑰方命圯族：违抗命令，破坏族类。圯，毁坏。

⑱《书》：即《尚书》，以下引文出自《尚书·大诰》。



⑲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判决罪行拿不准时,从轻处置。奖赏功劳拿不准时,从重奖赏。

⑳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犯不守成法办事的错误。 经,成法。

㉑忍人:残忍、暴戾的人。

㉒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这样奖赏的作用只落到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身上。

㉓疑:指赏罚不能确定。

㉔《诗》:指《诗经》。引诗见《诗·小雅·巧言》。

㉕祉:福,喜。

㉖乱庶遄已:变乱迅速停止。 遄,迅速。

㉗沮:止。

㉘已乱:制止祸乱。

㉙《春秋》: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修订鲁史而成书,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㉚因其褒贬之义:根据《春秋》褒贬善恶的原则。

【集评】

宋罗大经(《三苏文范》卷五引):庄子之文,以无为有,东坡平生极熟此书,故其为文驾空行危,惟意所到。其论刑赏也,曰“杀之,三”等议论,读者皆知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将无作有,是古今议论之杰然者。

明钱文登(引书同上):东坡尝言:“凡文章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绚。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观东坡此论,是何等气象,何等彩色!初学读之,下笔自滂沛无窒塞之病。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卷一百三十三：东坡试论文字，悠扬宛宕，于今场屋中极利者也。

明唐顺之《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此文一意翻作数段。

明杨慎（《三苏文范》卷五引）：此东坡所作时论也，天才灿然。自不可及。每段述事，而以婉言警语，且有章调。

明王世贞（引书同上）：此篇只就本旨，从疑上写其忠厚之至。一意翻作三段，非长公笔力不能如此敷畅。

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全集录》卷一：风气将开，拔此大才，以奏扫荡廓清之烈，欧阳公力也。

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卷八：东坡自谓文如行云流水，即应试论可见。学者读之，用笔自然圆畅。中间“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一段，议论极有至理。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此长公应试文也。只就本旨，从“疑”上全写其忠厚之至。每段述事，而断以婉言警语。天才灿然，自不可及。

清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以“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二语作主，文势如川云岭月，其出不穷。以长公之高才，欧文忠之巨眼，而闺中遇合之文，圆熟流美如是，宜后世墨卷不矜高格也。为之三叹。

【鉴赏】

本文是苏轼应礼部科举考试的试卷。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苏轼）《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即第一名），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文坛领袖。他不但以自己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领导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时文”（即“骈体文”），而且利用职权推行这一革新主张。嘉祐二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主持礼部考试，他决定，写“时文”者一律不取，有力地打击了“时文”华而不实的文风，大大推进了古文运动。欧阳发《先公事迹》：“嘉祐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四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恐怨谤。其后稍稍信服。”当时，落榜的举子曾在大街上围攻考官欧阳修，据《林下偶谈》所说：“欧公初取东坡，则群朝聚骂者动满千百。”可见反对者之多。但欧阳修持有皇帝赐书“文儒”二字，更



有推行古文的决心，故能临事不惊，坚强不屈。说明当时的诗文改革和反改革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苏轼在考场上写的这篇文章，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对于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来说，是个有力的支持和很大的贡献。苏轼与其弟苏辙同考同登进士第。苏辙也有一篇同名的考卷，可参考阅读。嘉祐二年“三苏”同在京师，苏洵感叹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见无名氏《史阙》）。此时，“三苏”名动京师。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一考题，出自《尚书·大禹谟》孔安国的注文：“刑疑从轻，赏疑从众（重），忠厚之至。”所有考生同作一题，竞争是很激烈的。为了引起考官的注意，苏轼在开头结尾、布局谋篇、立论说理、行文用典等方面都是很用心的，表现出苏轼青年时代写作的高度技巧：

一、引古咏叹，起法不凡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启行之辞，就是文章的开头。逆，是“迎”的意思，逆萌，是迎引萌发。中篇，指文章的主体，中篇之意，就是文章的主题。刘勰这句话提出了文章开头的两个原则：一是迎引下文，如泉源引出江河；二是萌发主题，如植物的新芽，短小精美而有生长成材的生命力。

本文的开头是符合以上原则的，但又不同凡响。首句指出“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即下文所谓“先王之时”，“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这一感叹句正是“刑赏忠厚之至”，用咏叹的方式点破题旨。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所说：“正是忠厚处，一篇主意，在此一句。总冒以咏叹起，另是一种起法。”可以说，“引古咏叹”是本文非同凡响的一种开头方法。

二、“疑”字立骨，贯穿全篇

“刑赏忠厚之至”，可以归结到儒家的“仁”字上，但这是容易看见的表面。一般考生多从“仁”字上立论，其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形成时文滥调。苏轼之文不落窠臼，揭开表面，深入实际，抓住“疑”字这关键，“此长公（苏轼）应试文也，只就本旨，从‘疑’上全写忠厚之至”（《古文观止》）。本文以“疑”字立论，一字立骨，贯穿全篇。当文章引用“传曰”（赏疑从与，罚疑从去）时，《古文观止》评曰：“当赏而疑，则宁与之；当罚而疑，则宁不致罚。就‘疑’字见出忠厚来，篇中不出此意。”当文章引用“书曰”（罪疑唯轻，功疑唯重）时，《古文观止》评曰：“罪可疑者，则从轻以罚之；功可疑者，则从重以赏之。法可以杀可以无杀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生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李扶九说：“上引传，此引《书》，皆见忠厚之意”（《古文笔法百篇》）。沈德潜说：“以罪疑唯轻，功疑唯重，二语作主，文势如川云岭月，其出不穷”（《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在文章的“结穴之文”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仁……)处,仍是“‘疑’字点睛,到底不脱”(《古文笔法百篇》)。以上三处,均在“疑”字上做文章,“疑”字成了全篇的骨架。这就是古文笔法中的所谓“一字立骨”法。那么,苏轼为什么选择“疑”字立骨(即立论)呢?李扶九解释说:“刑赏不可废,惟疑者可从厚,文故拈出‘疑’字立论,最为精细。盖‘仁’字尚是忠厚之面,唯‘疑’字方是‘刑赏忠厚’之所以然”(《古文笔法百篇》)。“仁”只是忠厚的表现,而‘疑’才是实质,才是“所以然”,才是问题关键,抓住“疑”字这个关键做文章,才使这篇考试文卷“鹤立鸡群”,冠于“多士”之上。

三、引经据传,凿凿有凭

考场答卷,不能象书斋作文章那样随意翻阅资料,所以“浮泛”者较多。而苏轼博闻强记,功底较深,虽在考场,仍能引经据传,凿凿有凭,使文章深刻而有说服力,自然非浮泛者比。本文“引经据传”,除标题之外,共有七处之多。第一段两处,头一处是:“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此典见于《尚书·皋陶谟》,其中记载古代君臣对话,多用“吁”(表示慨叹)、“俞”(表示同意)等语气助词,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感情。这里主要指圣君贤臣们对“忠厚之至”的感叹!第二处“告之以祥刑”。语出《尚书·吕刑》:“王曰:吁,来!有邦有土(诸侯)。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祥刑,慎刑。一说是善刑,即好法律。《吕刑》篇将周刑与苗族刑法作了对比分析,指出周刑仁厚宽大。所以苏轼引为“忠厚”的例证。第二段有四处:头一处,“传曰”,语出《汉书·冯野王传》;第四处“书曰”,见《尚书·大禹谟》(苏轼所引《尚书》,都指晋人梅賾伪古文《尚书》,那时还未发现它是伪书)。这两处前边已经谈过,都是为了说明本文主旨“疑”字而引用的。中间两处,“皋陶杀人”,是为了说明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四岳用鲧”,事见《尚书·尧典》,是为了说明对于可用、可不用的人,擢用应以宽厚。第三段有一处,所引四句诗,出自《诗经·小雅·巧言》,是为了说明“仁”的。从以上七处用典来看,都是为了表现主题并为主题服务的,都是为了使人相信自己所论的内容是“凿凿有凭”的,从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作为考卷,当然是为了引起主考官的注意,从而得到选拔,目的是很明显的。关于这篇考卷的用典,宋代曾流传一段“佳话”: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必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陆游《老学庵笔记》)



《诚斋诗话》也有类似的记载。于是波及文章评点学界，沈德潜据此在评语中定为“以虚为实案”（见《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吴楚材、吴调侯摘引以上“佳话”；李扶九摘引后感叹说：“噫！用杜撰亦使人惊如此，其才何如哉。后遂传为笑谈，则又杜撰中之公案也。名人之语，无不乐传如此”（见《古文笔法百篇》）。其实，《老学庵笔记》、《诚斋诗话》所记是不实的。实际上“杀之，三；宥之，三”并非苏轼杜撰，而是有出处的，出自小戴《礼记》中的《文王世子》，记载周公对于公族判刑的仪式：“有司谏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公又使之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苏轼在场屋作文，手头无资料可翻阅，将周公与有司的对话误记为皋陶与尧帝的对话，造成张冠李戴的情况，兴许是有情可原的。但笔记小说者流，不识出处，于是加以增饰，造作出这段“佳话”，或者是不加考证，随便记下当时的传说来，也未可知，因而闹出笑话来。更令人不解或者说发人深思的是，一些文章评点家也不加考证，凭信那些“笔记”之误，以讹传讹，把实有出处的事情，误说成苏轼随意杜撰了。这种人云亦云的错误，甚至于象沈德潜这样的大学者也不能幸免。由此可见，对于古代“笔记”之类的书籍，不能全信，更不能盲目崇信，以讹传讹，以上几位文章评点家的“以虚为实案”或者“杜撰公案”，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该是得到纠正的时候了。

四、行云流水，叠宕出新

本文第四自然段，从“可以赏，可以无赏”到“故曰：忠厚之至也”，是全文中写得最畅快的段落，是苏轼的得力之笔，至理快论。《古文观止》称赞说：“下乃畅发题旨，得意疾书，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李扶九评说：“公平生为文，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此篇灏气英光溢于简外，入后以‘仁’、‘义’二字畅论刑赏，于尺幅中具长江、大河之势，尤属千古无匹。当日因疑而抑其不冠多士，未免屈公文矣”（《古文笔法百篇》）。此段文字畅达淋漓，充分体现了苏轼“行云流水，无不尽意”的文章风格。

这一段文字可从“古者赏不以爵禄”句分开，之前为第一层，之后为第二层。前一层从“仁可过，义不可过”的角度分析“刑赏”；第二层接着“又将刑赏振宕一翻，下便一转而入，快利无前”（《古文观止》夹批）。第二层仍然是议论“刑赏”，但是角度不同，是从“爵禄”和“刀锯”这个角度来分析“刑赏”的，这样一“叠”从而又“宕”出“爵禄不足以劝，刀锯不足以裁”的新意来。这种笔法叫作“叠宕出新”法。这种笔法的作用是，通过复叠，加深印象，同时从中振宕出新意，使文章得到深入而进一步向前发展。真是一举两得。



细读全文,不仅此处运用“叠宕出新”法,而且这种笔法贯穿了全篇。全文分三大段(共五小段),第一大段写古代(包括尧至周)的刑赏忠厚。可分两小段,第一小段写尧舜至成康盛世的忠厚;第二小段写周衰而忠厚犹存,都是写古代的忠厚,后段是前段的复叠,从而振宕出周衰时《吕刑》忠厚的新意。第二大段立“疑”字为论点论述刑赏忠厚。也分二小段,前段引用书传为论据,论述忠厚,后段在引文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论述忠厚,可以说是前段的复叠,从而振宕出“仁可过,义不可过”、“爵禄不足以劝,刀锯不足以裁”的新意,采用的也是“叠宕出新”法。在第二大段的结尾,用“是故”加以总结,以“故曰”点出“忠厚之至也”,“文气已完”(《古文观止》夹批),第三段在结构上是结尾,是“馀波”,在内容上是前段的复叠,从而振宕出“《春秋》之义”,补充说明,“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也是(文中用“亦”)“忠厚之至也”。明显表示,此处仍然用的是“叠宕出新”法。全文步步“叠”,步步“宕”,复叠以夯实内容,振宕而出新意,犹如后浪推前浪,波浪滚滚,奔腾而下,而又当止则止,留有“馀波”。文章结构严密而完整,议论深刻而畅达,是一篇做工精细的好文章。

本文虽有引文张冠李戴等纰谬之处,但从文风来说,完全抛弃萎靡绮丽的时文骈句,采用散体,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当时的古文运动,是有胆略、有卓识的。何况这是“场屋之文”,深得考官欧公的慧眼赏识,因而沈德潜说这是一篇“三叹文章”,他说:“以长公之才,欧文忠之巨眼,而闾中遇合之文,圆熟流美如是,宜后世墨卷不矜高格也,为之三叹”(《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